

叶海林 著

当代中印 关系研究

理论创新与战略选择

印 度 洋 地 区 研 究 丛 书

SINO-INDIA RELATIONS
IN 21ST CENTURY

THEORY INNOVATION AND
STRATEGY RECOMMEND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叶海林 著

当代中印 关系研究

理论创新与战略选择

印 度 洋 地 区 研 究 丛 书

SINO-INDIA RELATIONS
IN 21ST CENTURY

THEORY INNOVATION AND
STRATEGY RECOMMENDATION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当代中印关系研究：理论创新与战略选择 / 叶海林
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 12
（印度洋地区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201 - 4054 - 6

I. ①当… II. ①叶… III. ①中印关系 - 研究 - 现代
IV. ①D822. 335.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79037 号

· 印度洋地区研究丛书 ·

当代中印关系研究：理论创新与战略选择

著 者 / 叶海林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恽 薇 冯咏梅

责任编辑 / 冯咏梅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经济与管理分社（010）5936722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83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12.25 字 数：171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12 月第 1 版 201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201 - 4054 - 6

定 价 / 7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 - 59367028）联系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代序：如何以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论指导中印关系实践？

中印关系是亚洲乃至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在中国周边外交战略格局中占有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积极发展全球伙伴关系，扩大同各国的利益交汇点，推进大国协调和合作，构建总体稳定、均衡发展的大国关系框架，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加强同各国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交流合作，推进人大、政协、军队、地方、人民团体等的对外交往”。党的十九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六大形成的将中国外交对象依照大国、周边和发展中国家的标准进行分类的表示，创新之处在于进一步丰富了新时期中国大国外交、周边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的具体指导思想。“按照亲诚惠容理念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周边外交方针深化同周边国家关系，秉持正确义利观和真实亲诚理念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这是对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指导思想的高度概括。

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思想指导下的重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中国外交特别是周边外交，以及改革开放以来加强经济合作、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引导下的为经济建

设服务的中国周边外交来说，党的十九大以后，中国周边外交迎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大国、亚太强国之后的新时代。

尽管中国未来仍将长期是发展中国家的一员，但在政治影响力、经济辐射力、军事投送力以及文化输出力等大国强国地位衡量指数方面已经居世界前列，在亚太地区事务层面更是拥有了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规则制定与维护能力，并且早已成为地区繁荣的发动机。中国身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兼为世界大国和亚太强国，这恰恰揭示出传统国际秩序正在面临深刻的结构性变迁。中国的周边战略只能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进行本质意义上调整的时代背景下制定和执行，其执行过程与效果也将成为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调整的组成部分。

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未来长期的外交任务特别是周边外交任务，仍将是为中国的发展争取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尤其是周边环境。而作为世界大国，中国又势必履行与自身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义务；作为地区强国，中国还需要承担必要的地区秩序维护责任，行使必要的地区规则制定权，以回应周边国家对与强国为邻的期待和忧虑。正确认识并协调多种维度下不同国家定位之间的关联，是中国新时期大国强国周边外交的关键命题之一。

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一直在探索如何妥善处理三对关系。

一是中国自身发展利益和中国国际担当之间的关系。将中国自身的发展利益与中国的国际责任结合在一起，相互促进，在理论上是可能的。实际上，国际关系史表明，将承担国际责任的行动转化为谋求国际权力特别是规则制定权与秩序维护权，是地区强国成长为世界强国的普遍途径。

不过，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必须时刻注意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既不能一味地从实用主义甚至短期的功利主义心态出发，只强调自身利益，回避甚至拒绝承担国际责任，也不能为了体现自己的强国地位，在地区事务上过度支付成本，尤其不能为了获得国际和地区国家的“点赞”而迟滞甚至弱化谋求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



利益。实际上，这也是一个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如何平衡的问题。近期中国就解决缅甸“罗兴亚人危机”问题提出了“三步走”方案，并表示愿意协助斡旋孟加拉国与缅甸之间的对话协商，这是中国在周边勇于维护地区秩序、承担国际责任的最新展示之一。

二是发挥地区强国作用与保持战略克制之间的关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可能通过回避矛盾来为自己争取发展空间，因为中国发展所需要的空间越来越广阔，这种形势使得中国必须更加主动地参与地区事务。同时，周边国家对华的战略期待和战略疑虑也在不断上升。中国既需要团结周边国家，让它们感受到中国亲诚惠容的良好意愿，也需要避免在周边释放对稳定的过强偏好，避免周边以中国需要稳定为由向中国索取“稳定报偿”。

这意味着中国在周边要建立可靠的行为预期，通过明确的奖惩机制促使周边地区支持中国倡议但不试图挑战中国的核心关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保持战略模糊并不总是值得提倡的。在这方面，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了强化战略目标清晰表达的益处。近年来，中国与菲律宾不断趋于良性的互动，以及中国的东南亚外交将南海局势从暗流涌动逐步转变为合作之海的过程，不仅体现了中国惠及周边的经济能力，也证明了中国将底线明确化的战略和战术价值。

三是中国稳定与现行体系主导国家关系的需求和抵御战略挤压之间的关系。随着中国的加速崛起，中国的战略对手将不得不试图在中国周边地区而不是中国领土外缘对中国进行牵制。换言之，围堵中国已经很难在中国家门口实施，决定围堵策略能否奏效的不再是抵近侦察这类直接的军事挑衅的动作，而是能否在中国周边地区建立由域外强国主导的排斥中国参与的区域机制。而中国要抵消这一战略图谋，只能通过积极主动的周边外交谋略。

在积极主动地推进周边外交过程中，中国无法避免和现行区域体系之间爆发遭遇战。如何以最小化的风险寻求最大程度的突破，是中国周边外交中处理与周边秩序主导国之间关系的关键。不论中

美两国之间在全球事务层面存在多少共识，必须承认，在周边事务层面，中美两国真正的共赢甚至利益协调空间并不充分。

出于维护中国的利益与尊严，以及在周边建立中国负责任强国形象的考虑，中国需要在处理与美战略协调的同时，保持一定的关系张力。中国不应该寻求与美国的对抗，但也不能回避甚至掩盖中美之间巨大的结构性矛盾。新时期中国的强国周边外交，既要体现强国的力量与尊严，又要避免陷入强者必霸的循环。这考验的不仅是中国的外交智慧，更是中国的决策胆略和实施意志。

在中国周边外交当中，中印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维度。中印两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多个政府间高层对话机制，主要包括中印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始于 2011 年的中印战略经济对话机制、始于 2015 年的高级别安全和反恐会晤机制以及 2017 年 2 月恢复的中印战略对话机制。2011 年，温家宝总理访问印度期间，曾与印方达成共识，实现中印两国元首和政府首脑定期会晤机制。2014 年，双方还同意在两军总部、相邻军区和边防部队之间建立定期会晤机制。这充分说明了中印两国对双边关系的重视。

但是，必须看到，重视并不必然代表友好。实际上，随着近年来国际关系格局的调整和秩序的演变，先后崛起的中印两国对国际体系的认识、期待与诉求都发生了至关重要的变化，各自对外战略也在深度调整过程中。应该承认，中印两国尽管都是亚洲新兴经济体的代表和成长中的世界大国，然而两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和实现路径始终存在巨大的差别，这种差别未来还可能继续扩大。中国崛起的障碍主要来自美国，南亚次大陆和印度洋区域并不是中国的战略重点方向，中国在这一方向的基本诉求是保证战略稳定，避免分散精力，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以较小的成本扩大经济乃至政治影响力。而印度认为中国才是其崛起的最关键制约因素，美国则是其崛起的重要助力。双方在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研判上存在显著差异。这种认知上的差异不是通过对话和交流就能弥合的。虽然印度并不必然响应美国的“印太”概念，但无论如何，印度都不愿意看到中



国在亚太地区扩大影响力与提高话语权。在印度的对华战略思维中，竞争意识和疑虑心态是无法消除的，印度也不会在中国遭遇美国压力时支持中国的立场和主张。这是由印度的国家利益决定的，而不仅仅源自印度在对华战略方面存在的偏见。中国只能争取将中印关系控制在合作与竞争并存、最大限度地避免对抗上，而不能寄希望于中印开展战略合作，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努力。中国应该正视这一点，对中印关系的期待不应过高。

此外，还需要考虑到，莫迪政府上台以来，对华战略思维的负面情绪不断累积，且印度与中国对抗的自信心也有所增强，“问题外交”策略不断强化，花样翻新，手段多样。作为莫迪对华“问题外交”的阶段性的定点，发生在2017年的洞朗事件虽然最终得到了妥善处置，但中印两国对洞朗事件的经验教训总结并不相同。相当一部分印度政要认为洞朗事件中印度的冒险策略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效果，测试了中国的意图，并在南亚中小国家中强化了印度能够在中印对抗中占上风的印象，因此可以预见，印度未来一段时间将利用中方不愿意在西南战略方向上分散过多精力的心态，对华立场将更加强硬，既要寻求在边界问题上占到更大便宜，又要以边界问题为筹码，讹诈中国在双边经贸、中巴经济走廊等问题上做出更多让步。印度的这种心态，既不利于中印关系现阶段保持稳定，也不利于中印关系的长期发展。

印度决策者目前的过度自信，已经成为中印关系健康发展的关键障碍。印度的对华政策是如何一步步走上当前以“问题外交”为基本手段的强硬路线的？到底是什么因素阻碍了中印两个发展中大国建立战略互信并开展合作？美国的“印太”概念将对印度外交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产生怎样的牵引性影响？最为关键的，中方在国际和地区形势变动剧烈的当前，应该执行怎样的对印策略才能既促使印度认识到中印两国存在的巨大实力差距，又体会到中国发展中印关系的良好意愿，以使印度从目前不利于双方相向而行的策略当中调整过来，认清时代发展的大势，深化与中国的务实合作？

以上这些问题，在 10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中印关系和印度外交研究的笔者看来，不仅是当前中国南亚学界关注的主要学术热点问题，而且是中国对印工作部门亟须回答的重要策略问题。

本书即在笔者 10 多年研究与思考的基础上，对上述问题做出的系统性回答。全书总论部分是笔者对中印关系问题常年思考的回顾与总结，也是全书内容的凝练与概括。第一章梳理了学术界近年来对国际体系变动与中印关系的研究成果，并做了述评。第二章讨论了印度洋地区的战略态势，以此作为进一步讨论中印关系的地缘基础。第三章解构了中印关系所涉及各个维度，并对中印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影响进行定性。第四章和第五章重点讨论了当前中印关系中的两个核心问题，即领土问题和印度与“一带一路”的关系问题，这两个问题不仅是中国相关学者一段时间以来研究的热点，而且是政策制定与执行部门关注的焦点，对解释中印关系的性质、判断中印关系的走向具有关键意义。第六章分析了莫迪政府的对华战略与策略，梳理了“问题外交”的内容、手段，并评估其政策效果。第七章关注中印关系的国际因素，研究了美国“印太”概念与印度对外政策的关联与互动。第八章是全书的重点，试图以中印关系为例，研究国际关系理论界一个被相对忽视的问题，即崛起国应该如何应对来自次要战略方向的挑战，试图实现理论创新，并提供笔者认为适宜的战略与策略选项。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中心副主任朱翠萍教授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笔者的学生刘佳俊、白雪、李铭恩对全书的完成亦有帮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当然，书中的任何疏漏和错误，均由笔者本人负责。

叶海林

2018 年 8 月

目录

代序：如何以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理论指导中印 关系实践？	001
总论：国际格局演变视野下的中印关系	001
一 莫迪上台以来的中印互动	002
二 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中印关系	003
三 洞朗事件的缘起与印度的考量	012
四 中国总体外交思维与印度“问题外交”思维的比较	015
五 对中印关系未来发展趋势的思考	019
第一章 国际体系变动语境下中印关系相关研究的 文献回顾	030
一 国际体系变动的相关研究现状和主要观点	031
二 国际体系变动下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对中国崛起 影响的研究	032

三	周边地区行为体对外战略与中国崛起关系的研究：以中印关系为例	034
四	国际学术界对中印互动及其前景的研究	039
第二章	当前南亚及印度洋地区战略态势	044
一	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地位	045
二	近年来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区域格局的演变和发展	050
三	中国的南亚及印度洋地区外交的基本诉求	055
第三章	中印关系的结构与相互需求	059
一	对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中印关系演变历程的简要回顾与考察	061
二	4C 并存的中印关系现状及各维度相互作用	064
三	印度与中国的不对等相互寻求	068
四	中印关系的结构基础对双方战略与策略的影响	071
第四章	洞朗事件与中印边界问题	075
一	印度挑起洞朗事件的意图、目标与手法	075
二	中方在处理边界问题上需要考量的因素	081
三	中印边界问题上中方可以考虑的中长期策略	084
第五章	中国在南亚推进“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度的关联	088
一	南亚地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地位	088
二	莫迪政府的南亚地区外交表现	093
三	在英迪拉主义和古杰拉尔主义之间摇摆的莫迪南亚战略	099

四	印度南亚战略对中国推进“一带一路”的影响	105
五	“一带一路”在南亚的支点国家选择	108
第六章	“问题外交”与莫迪政府对华策略	117
一	学术界对莫迪中国外交心态的研究	118
二	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策略的表象	125
三	莫迪政府对华“问题外交”的心理基础和 效果评估	131
第七章	美国“印太”概念与印度对外政策的 关联与互动	137
一	印度“印太”政策的演变	137
二	美国版“印太”概念推出后印度的反应	141
三	印度对“印太”框架强化参与的动机与意图	145
四	印度参与美国“印太”概念的前景和制约因素	149
第八章	崛起国应对次要战略方向挑战的理论与战略	152
一	崛起国在次要战略方向选择得失的历史启示	153
二	国际体系转变对中国周边态势的影响	159
三	南亚地区作为次要战略方向与主要战略方向的关联	166
四	洞朗事件后印度对华认知和策略调整及其原因	170
五	结论：崛起国面临次要战略方向挑战时的 难题与破解	177

总论：国际格局演变视野下的 中印关系

2017年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非法越界进入中国洞朗地区，双方对峙两个多月，这是自1987年以来中印在边界上发生的最严重对峙。这一事件对之前中印关系的良好走势造成了逆转，也对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投下了阴影。洞朗事件是中印两国近年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边境对峙，这次对峙和以往的类似事件存在重大差别，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在于洞朗事件发生在无争议的领土上。洞朗地区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是被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所确定的。而以往的对峙都是发生在双方都承认的所谓争议区，中印两国的国境线从未正式划定过，对于很多地方边境线的走势、某个具体地点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双方向来各执一词。在这些地方发生的对峙，可以说是在“争议区”发生的，双方也因此有了一定的外交协调空间。

然而，在中国看来，洞朗地区并不是争议领土，在这个地方发生对峙事件，其性质非常严重，中方的反应自然要比对两国其他类似对峙事件强烈得多，反应力度也要大得多，持续时间也相对较长。这也是为什么“洞朗对峙”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最终在

2017年8月28日才得以化解。2017年6月18日发生洞朗事件之前，中印两国之间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总体态势还算比较稳定。尤其是在2014年和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互访，为双方奠定了一个相对较为良好的合作基础。短短的两年之后，双方在边境上却发生了非常严重的事件，如何看待一段时间以来中印关系的走势，并且以洞朗事件作为一个转折点去看未来中印关系的发展，是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都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

一 莫迪上台以来的中印互动

从2014年正式执政到现在，莫迪的对华政策和此前国大党时期的曼莫汉·辛格政府相比有较大程度的修正，在总体外交基本路线不变的情况下变得更加积极主动。概括来说，莫迪的对华政策相对于辛格时期更加不关心中印两国双边关系的整体状态，也更加不在乎某一个意外事件会不会给中印关系造成长期的损坏。从莫迪的执政思路来看，莫迪是一个风格强势的国家领导人，更关注印度的大国地位，在对华关系、对巴关系以及其他事务上，这种个人色彩强烈的施政风格都时有体现。

2015年莫迪访华期间，印度媒体大量报道，印度准备毕其功于一役——把中印之间存在的所有问题在莫迪访华期间都一揽子解决。当然，实际上以中印双边客观状态来说，想在一次访问中解决所有问题并不现实。

从2016年开始，印度慢慢调整外交政策，从寄希望于一次性解决中印之间的所有问题，变成一个一个地按照印度的时间表和想法向中国提出问题，让这些问题来检验中印关系的现状，这就是笔者后来归纳的“问题外交”（Issue by Issue Diplomacy）。莫迪的思路和中国的对印思路是不太一样的。中国人在思考问题时更强调宏观架构，比如说与美国要建立新型大国关系、与俄罗斯建立的全面



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与巴基斯坦建立的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国更倾向于为双边关系做一个总体性界定，在这个界定的基础上，对双边关系所涉及的方方面面做出灵活处理。反观印度，至少是在莫迪时期，强调更多的是微观，也就是从一个个事件上看自身的得失利弊。这是中印两国在外交策略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差别。当然，中国也要看到外交策略差别实际上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有各自国家定位和对外基本战略考量在里面，并不仅仅是思维习惯的不同。

二 国际格局变动中的中印关系

不管人们怎么看印度的增长前景，都必须承认印度是近年来仅次于中国的一个在经济上表现非常抢眼的新兴大国。在金砖机制中，俄罗斯、巴西和南非的经济状况都不是特别令人满意，只有中国和印度的表现近年来可以说是并驾齐驱。在这种情况下，看待中印关系不能简单地用对亚洲国家之间的双边关系来衡量，而是要把它放在世界格局中去看。在全球格局下，中国可以把中印关系分成三个层面，在每一个层面，双方对对方的态度都有细微的差别。

首先，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和印度处在不同的位置上。

中国是现有国际体系的一个秩序维护者。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是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是世界贸易组织的正式成员，等等。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中的权重都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从一个基数大、底子薄的发展中大国逐步提升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连续多年是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贡献者。再加上中国原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使得在现行的国际体制下，中国主要以一个秩序规则维护者的形象出现，对全球事务、全球格局的稳定负有特殊责任。反观印度，其国际地位与中国还是有差距的。虽然曼莫汉·辛格执政以来印度的经济一直表现不错，但要达到中国的水平，或者说无论是在

总量上跟中国接近，还是在贡献率上跟中国接近，印度都还做不到。在国际政治秩序和安全秩序上，印度和中国的地位也不能比。印度毕竟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正努力申请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在很多国际组织中也不像中国那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在基本的国际秩序层面，中印两国的地位并不相称，显然中国占有明显优势。这样就形成了中印关系在国际舞台上的一种基本态势。

中国作为现有体系的维护者，印度作为一个希望在现有体系下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新兴大国，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等的。在国际事务层面，中国对印度的需求主要是希望与印度携手共建一个更公正、更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这是需要携手并进才能完成的，但显然两个国家的体量、分量、权重并不一样。印度对中国的需求更多的是着眼于自身的利益，也就是希望通过与中国的合作或向中国提出要求来满足提升自身国际地位的目的。例如，印度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对联合国安理会进行改革，印度希望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印度也希望中国能够赞同其成为核供应国集团的正式成员。对于这些利益和诉求，印度如果得不到中国的同意都是实现不了的。但是，中国希望更好地改革国际政治新秩序的诉求并不是非印度支持不可，中国还可以通过获得更多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而且在这个支持框架中，在中国的合作阵营中，印度只是其中的一个，并不是必需的一个。这是中国和印度在相互需求方面一个非常大的差距。

基于这个差距，中印两国看待对方的心态和策略显然是不一样的。中国不可能以损害中印双边关系中涉及中国的核心利益来争取印度的支持与合作。而对于印度，中国的支持则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因为如果中国不同意，即使美国同意，印度的要求也得不到满足。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的问题上，在核供应国集团的地位上，人们都可以看清这一点。

在国际事务层面，双方博弈也好，合作也好，相互需求也好，



都存在不对等。这种对等的性质决定了两国的心态大相径庭。印度对获得来自中国的赞同心理更加急切，更希望通过一种确定性方式来解决其所关心的全部问题。但是对中国来说，则要考虑得更加均衡一些。中国不仅要考虑印度的感受，而且要考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态度，特别是印度邻国的关切，所以中国不可能将印度作为主要的合作对象，在涉及印度的需求方面给印度太大的倾斜。这是不太现实的。

举两个具体的例子。一个例子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改革问题。多年来，印度一直与日本、巴西和德国绑定，提出联合国安理会的改革方案。在这个方案中，印度的需求就是不管跟谁合作，只要自己最后能够成为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就够了，所以跟谁合作、不跟谁合作其实是个策略问题。在印度看来，中国应该赞同其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为此，印度不仅在做中国的工作，而且在做其他国家的工作，如英国、法国、美国、俄罗斯，而且进展都还比较顺利。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其他几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权利与印度之间并没有什么太深的矛盾，只有一点区别是非常本质的，那就是美国虽然支持印度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但并不支持印度成为拥有否决权的常任理事国。也就是说，美国希望在联合国的框架下给印度一把永不撤走的椅子，但这把椅子所代表的权利与美国以及其他四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所享有的权利还是有差别的，印度只能永久参会，但没有否决权。印度可以赞成想赞成的事情，但反对不了想反对的事情。这是美国对印度在联合国安理会中地位和作用的考量。而中国的考量就复杂得多，不仅要考虑印度，而且要考虑其他国家。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态度自然不可能百分之百让印度满意，印度不能指望通过双边互动就能够让中国完全做出让其满意的举动，而中国是拥有否决权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如果中国不同意，印度的梦想无论如何都不能实现。

另一个例子是印度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1998年印度核试